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每期出版後，編輯都會選定幾篇重點推介文章，全文上載至敝刊網站和社交媒體（Facebook、微博），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其餘文章，為顧及訂戶權益，將會在出版半年後在敝刊網站全文發布，以饗各界讀者，敬希垂注。

——編者

國家體制還是精英偏見？

孫硯菲的論文〈國家能力與合法性：新冠疫情防控的比較社會學研究〉（《二十一世紀》2021年6月號）發表適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至今逾年半，影響遍及全球，該文分析正好讓我們鑒往知來。筆者擬從兩方面評述，分別是分析例子選擇和理論框架說明。

該文選擇了蒙古、中國等最佳案例國家作為分析例子，並以每百萬人口中之死亡數作為選擇依據，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但若從患者死亡率及其相對於總人口確診率之比例等不同數據來說明案例，或許讓分析基礎更見全面。以中國為例，其確診率為0.01%，但死亡率達到4.5%，死亡率偏高於其

他國家，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是發病最早的國家，其他國家可以中國經驗為依據，死亡率相對減少乃情理之內。新加坡和韓國同樣以追蹤隔離為主要防疫措施，但效果卻榮辱互見：以死亡率比較，新加坡0.05%，韓國1.33%；以確診率比較，新加坡1.08%，韓國0.27%。歐美四國確診率和死亡率方面則與該文相關論述相若同步，德國為2.8%和2.43%，荷蘭為4.3%和1.06%，英國為6.5%和2.79%，美國為10.3%和1.8%。抗疫成效較理想的亞洲各國以及斯洛伐克等國家，採取了追蹤隔離和封鎖措施，或二擇其一，歐美四國則沒有明顯採取相關措施者，從數字看，抗疫成效遜色。由此可見，該文之論證方向還是值得肯定的，以追蹤隔離和封鎖作為考量國家抗疫優劣之分析工具的選擇十分到位。

針對國家管理能力而言，該文理論框架設定為國家的自主性和滲透能力，自主性為「國家決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滲透能力則為「官僚體系效率、交通和通訊等讓國家政令得以有效貫徹的硬條件」。該文把兩者定性為相關係數高的變

項，國家危機認知是兩者執行力之前設，並從危機認知引申出另一概念，即「國家精英」。但如是令理論框架變得複雜，若把國家精英作為延伸討論而不在理論框架內，或許更為理想。其中韓國是有趣例子，其屬於抗疫較理想之國家，雖同為民主體制國家，但有別於歐美四國；該文理解為歐美四國之精英基本抗拒中國因素，不願意推行中國作為先行者之防疫措施，從而作出誤判，並指出這屬於危機認知，其引發原因是國家精英之偏見。然而，國家精英的偏見似無關乎國家體制。如果以危機認知作為該文的首要變項，也有力說明抗疫理想國家之分歧，但如果國家精英的偏見才是該文的關鍵，其實偏見與危機認知孰重孰輕，會否才是該文理論框架之核心？

林援森 香港

2021.6.22

跨國轉移了甚麼知識？

「新加坡經驗」確實有不少值得中國借鑒之處，借鑒的方式除了民間通道以外，也有官方引導的政府官員培訓。劉宏、王婷艷在〈「新加坡模式」與中國改革開放——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研究〉（《二十一世紀》2021年6月號）一文中，探討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給讀者呈現出一幅中國官員海外學習經驗的直觀圖，為背後蘊含的政治學、經濟

學，乃至社會學理論邏輯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

對於直接面對化解民眾糾紛、處理市場關係、調解官民衝突的地方精英而言，學習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的治民之道，已經超乎本土積累的固有經驗。新加坡經歷了經濟上的騰飛起躍與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其中的治民之道能為正準備進入現代化的中國提供重要的經驗借鑒，也包括啟發與教訓，這是基層政權在推進轄區現代化進程當中所必需的。正如文章指出，這種務實主義的策略選擇已經遠遠超過意識形態的約束、超出制度差異的範疇。基層政權有經驗需要，新加坡有經驗供給，自然衍生出這一階段跨國的知識轉移。

知識供需配合着官員晉升激勵與考核，形成了有趣的政治現象。那些資質較高、晉升提幹潛力大的官員，參與「市長班」培訓不僅解決了晉升當中學歷條件的「硬槓槓」，同時也為接下來提升政績做足了準備，南大「市長班」成為由後備幹部到前線幹部的「立交橋」。事後的經驗材料也足以表明，基層精英在新加坡所學所感，對回國之後的工作業績提升也有幫助，這與海外學習的設計意圖是契合的。

進入新時期，隨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成功推進，不少國家開始到中國淘取經驗，跨國知識轉移的通道如同雁行理論預測一般，使中國從跨國知識的輸入國逐漸向輸出國轉變。這種學習突破了意識形態、制度差異所建構的約束，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在跨國知識的轉移過程中，到底是哪類知識容易突破意識形態、制度、環境等的約束？哪些知識無法突破上述藩籬？還是說能否轉移與知識內容本身無關，而和知識傳遞的通道是否閉合有關？

馮國強 蘭州

2021.6.25

冷戰時期中越互動的「內向性」

二十一世紀以來，打破冷戰時以美蘇為首東西方對抗的敘事框架已經成為冷戰史研究的學術潮流，學者的研究旨趣亦隨之出現了兩類分野。一類受全球史興盛的影響，更關注冷戰格局下的社會變遷、經濟發展、文化思潮、技術革新、個人境遇等具有社會學面向的議題；一類則是對傳統國家間關係的再探討，重視考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外的國家，尤其關注冷戰期間朝鮮、韓國、越南、東西德等這些「近中心」國家對大國行動的引導與約束，發掘它們在非對稱關係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比起研究範式的轉化，後者的創新則更依賴於對歷史檔案的發掘。

近年以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和周邊國家研究院為核心，國內冷戰史學界形成了一個重要學術進程，即不斷拓展使用周邊國家和歐洲非英語國家檔案材料的渠道，利用多國多邊材料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游覽新作〈北越學習中國大躍進的歷史考察（1958-1960）〉（《二十一世紀》2021年

6月號）即是綜合利用越、俄、中等多語種資料對冷戰期間中越關係互動特點的再探討。

以往學界對1950年代中越關係研究大多集中於中國援越抗法和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外交事件。通過描述中越「同志加兄弟」外交關係的形成背景，這些論著較有力地論證了美蘇冷戰、去殖民化進程等體系性因素對中越關係的影響，特別是指出了中國對外政策、中蘇同盟對中越關係演變所施加的關鍵性作用，但是它們卻多少忽略了國內政治議程對中越關係的特殊影響。游覽的研究正是基於翔實的史料，考察了北越學習中國大躍進運動進行社會主義工農業建設的歷史過程及其後果，發掘了中越關係中觀念性要素流動與「單位層次」的關聯性，進而揭示了冷戰期間中越關係的「內向性」特徵。

所謂「內向性」是指，中國和北越作為戰後東亞新興的民族國家，進行現代國家建設是雙方同盟關係的主要內容。中越在1950年初共同倒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了「指導與被指導」、「援助與被援助」的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不僅意味着中國要承擔起支援越南民族獨立與解放的責任，而且中國也有指導越南進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國際主義使命。從這個角度說，圍繞現代化建設這樣一項國內政治議程去研究中越雙方關於大躍進的政策互動，對完整理解這一時期的中越關係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亦是該文超越一般冷戰敘事的獨特之處。

烏力吉 北京

2021.7.14